

名家学术访谈:收入增长与包容性发展

史晋川,周阳敏

名家简介:史晋川,祖籍山西,1957年生于杭州,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兼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外国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年被列入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学术带头人和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周阳敏:尊敬的史老师:您好! 您认为中国应壮大和稳定中产阶级来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然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虚无概念,与国际社会定义的中产阶级相去甚远,但问题是,其他国家稳定中产阶级可以从选举中获得大数定理所给定的选票优势,而在中国却没有这个内在机制,那么如何壮大和稳定中产阶级? 其内在动力是什么?

史晋川:现代国家的中产阶级是在宪政体制下形成的,所以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和公民社会的建立实际上是一回事。在中国讲中产阶级,目前为止主要还是集中在收入标准方面,所以实际上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讲的是中等收入阶层这样一个概念。

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不公平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中国的效率,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经济学家不会为关心公平而关心公平,经济学家更注重的是当公平问题影响到效率的时候如何看待公平问题。举例说,如果你把很多劳动者的工资都压的很低,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就不合理了,这种不合理就指引企业在要素组合配置过程中偏向于使用价格相对便宜的要素,这显然对我们的自主创新、技术升级、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等都会产生影响。同样,中国是出口依存度高的经济体,出口产品的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强,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部门工资压的越低,成本就越低,那么竞争力就越强。所以在一个出口依存度高的国家,个人的工资压的越低越好,因为工资只是成本。但是我们现在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把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出口、消费、投资三者协调拉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企业家会认为,是不是劳动者收入提高了我们的成本就上升了?但是我们要明白,劳动者

的收入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企业产品的市场,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其作为“成本”的一面,也要看到其作为“购买力”的一面。从这些角度来说,我们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收入分配的改变等各种方式来形成一个中等收入阶层,还是有必要的。而且,倘若一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没有形成,对整个社会的舆论情绪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我们讲“恒产者有恒心”,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太少,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摆脱了低收入陷阱进入 3000 美元之后,为什么其后的发展就受到很大阻碍? 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无法达到 10000 美元进入高收入行列,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导致国家经济结构的扭曲,产业结构的扭曲,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不稳定,以及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缺乏。所以中等收入阶级的问题不只是老百姓所占多少比例的问题,它还涉及到经济、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解决好中等收入阶级的问题对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是十分有好处的。

周阳敏:通过提高个人的收入来提高购买力,这就会产生一个“搭便车”的行为,个别的企业家或者独立决策的企业家在博弈的过程中就会选择搭便车,如果大量的搭便车就很难形成这样一个中等收入阶层。您觉得呢?!

史晋川:搭便车在每个社会都会存在。我们知道收入分配有两种,一种是功能型收入分配,另一种是个人收入分配。现在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个人收入分配在经济学范畴里是以公平为原则的。但实际上在中国,这个问题就不仅是在个人分配上的不合理,在功能收入分配上就存在不合理。也就是说,劳动者或者部分要素所有者,并没有按照他所投入的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来确定他收入的分

配。这个问题的解决关键看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法律的完善,还有一个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按 60 岁算,我们国家今年已经到了劳动力零增长的阶段,若按 65 岁算,到 2015 年是劳动力零增长的年份。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会越来越凸显,如果法律完善了,市场机制健全了,企业搭便车行为就是不可行的,也是不能持续下去的。

米哈尔·卡莱斯基说过,工人的收入就是他的开支,而资本家的开支就是他的收入。意思是说,劳动者基本以消费为主,所以有多少收入就能消费多少,收入是他消费的一个约束条件,而资本家的钱主要是用来投资的,消费的比重很小,所以他的开支就是他的收入。另外我们与哈罗德—多马模型结合起来,投资具有两重性。我们知道如果社会需求不足,就需要“注入”,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这个“注入”可以是投资,也可以是消费。如果是投资的两重性,首先他在本期作为总需求的一个因素,但是下一期就会变成总供给的一个因素,这样经济就需要一个动态的平衡。如果在这个动态平衡当中,在总需求方面的“注入”是以投资为主的,那这个过程就很难收敛,但如果“注入”的是消费为主,就会相对平稳和可持续。这在新剑桥的模型中也是很明显的。一旦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偏离,新古典认为可以调整投资系数,而新剑桥认为可以调整储蓄率,因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边际储蓄现象是不一样的,资本所有者的边际储蓄率高,而劳动者的边际储蓄率低,所以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就可以控制储蓄率,使经济达到比较平衡的状态。所以从米哈尔·卡莱斯基的这句话,哈罗德模型和新剑桥卡尔多—希克斯模型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就要将投资为主转变为以消费为主,这样可以避免经济体不可控因素的增长。

周阳敏:史老师,您说如果浙江在“十二五”期间不提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浙江经济将不进则退,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我的问题是,如果像浙江这样的发达省份在“十二五”期间还要拼命发展 GDP,那么像其他欠发达省份或者落后地区,岂不是更要拼命发展 GDP? 那么,这与我们的包容性增长目标是不是矛盾?

史晋川:我认为 GDP 的增长速度和 GDP 的增长方式是两个问题。浙江省 2010 年的人均 GDP 去年是 7690.20 美元,杭州市人均 GDP 是 10103 美元,我们在给杭州做规划的时候发现,各项指标比如居民的用电量、汽车的油量等,用人均水平一算就仅仅相当于日本京都 70 年代后期的水平。而且把现在的美元折成 80 年代的美元,那么现在的 2.5 个美元相当于以前的 1 个美元,所以我们的经济水平实际上还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一个水平。总量按照可比价美元来折算是如此,按照居民生活水平各项指标折算也是如此,再看产业结构的比较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不要

高估沿海发达地区的实际发展水平,有汇率等因素的存在,实际水平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是要维持一个比较平稳较快的发展速度。

我们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要转变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前靠加大要素投入、压低工资、污染环境等,那么现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前的方式就要造成人和自然的不和谐、造成人和人之间的不和谐。所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一个重点问题。浙江省“十二五”期间是转型发展阶段,我们提出四个转型: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核心的经济转型;第二,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和改善民生为核心的社会转型;第三,新型城市化的推进和经济空间的优化布局为核心的城市转型;第四,克服阻碍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的制度障碍的体制转型。这就是我们说的全面的转型发展,这才是重要的问题。

当然,GDP 的高低是一个问题,GDP 过高就意味着不可能用转型的方式达到目标,要客观地分析使用转型发展的方式去达到目标能达到什么水平,不能为了显示转型发展的决心就认为“转型发展的时候 GDP 的增长速度不可能那么快”,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真正实现了转型发展,GDP 增长速度反而下降,而且还是处于工业中期阶段,这本身也是不正常的。我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说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农村居民的货币纯收入的增长率能不能跟 GDP 增长率基本保持同步,如果能做到,GDP 指标定多高也可以。所以我们要做到人和自然要和谐,人也要和谐。

周阳敏:史老师,不管是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还是其他市场等方面的状况,包括收入分配的比例和速度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其增长的基数是不一样的,GDP 增长的基数大,而人均收入增长的基数低,即使假设两者的增长率是相同的话,那么实际增长水平仍然是不同的。

史晋川:你这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在基数不一样的情况下,比方说资本收入的数量多,劳动收入的数量少,即使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跟 GDP 的增长速度同步增长,甚至劳动收入比 GDP 增长都快一点,都还可能出现在两者的绝对差额上加大,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总比以前要好一些,而且政府也能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采取一些措施,比方说这次的个税调整,起征点调到 3000 元,从九级标准调到七级标准,19000 元以下减税,19000 元以上征税,这是很好的。

(本访谈作于杭州 2012 年夏,史晋川教授还就集约增长、内涵增长与包容性增长的区别,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与包容性增长关系,包容性增长是需要公共支出扩大还是减小,以及包容性增长是否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本访谈相关主题的论文见本期刊发的:周阳敏、轩会永《基于包容性的农民收入增长路径研究》,高友才、周柯、曹东坡《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与包容性产业创新》)